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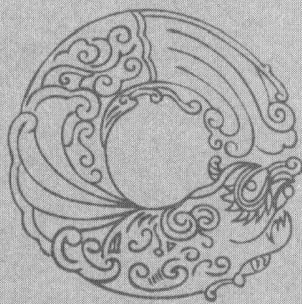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传承学术丛书

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 编译和研究

史少博 [日] 土田健次郎 许家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遗产学术丛书

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 编译和研究

史少博 [日] 土田健次郎 许家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史少博, (日) 土田健次郎,
许家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6871 - 4

I. ①日… II. ①史… ②土… ③许… III. ①哲学家—著作
研究—研究—日本 IV. ①B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19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75
插 页	2
字 数	291 千字
定 价	62.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尽管日本近代著名学者中江兆民说：“我们日本从古到现在，一直没哲学。”^①但是大多数专家、学者还是认为日本有哲学，并且认为从古代712年著述的《古事记》与720年的《日本书纪》开始，日本的哲学思想就开始萌芽。而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时间，甚至比日本哲学思想的萌芽产生的时间还要早。其证据就是标志日本哲学产生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记载了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情况。

日本重要哲学家众多，日本重要哲学家的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对这些著作进行编译和研究绝非易事。本书主要选择对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浅见纲斋、本居宣长的著作进行编译和研究。伊藤仁斋在江户前期是少有的纯粹儒者，伊藤仁斋对皇室持有崇敬的观念，对神道没有言及，这在当时的儒者中可以说是个异例。伊藤仁斋11岁读中国儒学经典，开始崇奉宋儒的理气学说，中年时期怀疑宋儒背离孔子和孟子，于是摈弃朱子学，独尊孔、孟，主张恢复儒家经典的古义，伊藤仁斋在京都堀川开设私塾“古义堂”，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一批著名的儒学家，形成古义学派，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浅见纲斋是山崎暗斋的门下，是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而山崎暗斋（日语：山崎闇齋）（1618—1682）是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也是江户时代日本重要的哲学家。山崎暗斋弃佛教而归于儒教，成为儒学者后信奉朱子学，并在京都、江户（今东京）组织讲学，山崎暗斋综合唯一神道、吉川神道等神道派别，从而把朱子学和神道结合起来创立了垂加神道，并且形成一个学派。山崎暗斋的弟子大约有6000人，其中包括所谓“崎门三杰”：浅见纲斋、三宅尚斋、佐藤直方。这一学派以研究中国儒学中的朱子学为重点，使儒家的思想和日本的神道相结合。浅见

① [日]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纲斋主要著作有《靖献遗言》八卷等。本居宣长提倡日本民族固有的情感，以抵抑儒学，《古事记传》是江户时代的国学者本居宣长注解《古事记》的著作。本居宣长认为《古事记》未受从中国输入的儒、佛思想影响，而其中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固有思想，并且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古事记》是信史。于是，本居宣长把日本说成是普照四方的太阳神天照大神出生的国家，因而是世界万国的本源，而日本天皇正是天照大神的后嗣，会传之万世。本书通过对这几位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研究，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儒家思想如何在和日本本土文化的对决中进行融合而形成日本文化。

本书主要编译了本居宣长《古事记传》的重要章节、浅见纲斋著作的重要部分，并对伊藤仁斋思想进行了研究，继而比较了江户时期伊藤仁斋儒学派和山崎暗斋儒学派之异同。并且对江户时期松村九山的《管仲孟子论》、日尾荆山的《管仲非仁者辨》及江户时期的历史意识等也进行了研究。最后还关注了具有“人生命为首要原则”的“人本”思想的代表——广濑弘忠的“灾害预知和灾害警报”视阈。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哲学的发展及重要哲学家概述.....	1
第一节 日本哲学的发展.....	1
第二节 日本重要哲学家概述.....	2
第三节 儒家思想在日本传播与研究的发展.....	3
第四节 儒家思想在日本本土化的过程中的派系对决	10
第二章 《古事记传》(节选)	19
第一节 《古事记传》卷一:直毘灵	19
第二节 《古事记传》卷六:三贵子诞生	25
第三节 《古事记传》卷一五:天孙降临	29
第四节 《古事记传》卷一九:神武东征中	53
第三章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74
第一节 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	74
第二节 推崇“道”、否定儒学思想	76
第三节 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	78
第四章 浅见纲斋主要著作	80
第一节 靖献遗言	80
第二节 足利尊氏弑二品亲王论	88
第三节 纲斋先生语录	89
第四节 道义诸篇	98

第五章 浅见纲斋的《养子辩证》及研究	128
第一节 《养子辩证》原文	128
第二节 江户时期儒学家浅见纲斋《养子辩证》之探析	132
第六章 松村九山的《管仲孟子论》及研究	140
第一节 《管仲孟子论》原文	140
第二节 江户时期的松村九山《管仲孟子论》之思想	150
第七章 日尾荆山的《管仲非仁者辨》及研究	158
第一节 《管仲非仁者辨》原文	158
第二节 江户时期儒学家日尾荆山《管仲非仁者辨》之探析	163
第八章 伊藤仁斋的《易经古义》及研究	171
第一节 《易经古义》	171
第二节 江户时期伊藤仁斋《易经古义》之探析	182
第九章 伊藤仁斋的达成	
——作为日本日常思想的“仁”	189
第一节 他者的视线	189
第二节 同志会	191
第三节 “仁”的中心	192
第四节 德之涵养	194
第十章 伊藤仁斋的性格	
——从与戴震、荻生徂徕比较的视野分析	196
第一节 伊藤仁斋和戴震的类似点	196
第二节 戴震和伊藤仁斋的差异	197
第三节 关于戴震的想象力	198
第四节 自己完成的问题	200
第五节 关系性的思想	202
第六节 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	204

第十一章 江户时期伊藤仁斋儒学派和山崎暗斋儒学派之异同·····	206
第一节 伊藤仁斋儒学派和山崎暗斋儒学派之同·····	206
第二节 伊藤仁斋儒学派和山崎暗斋儒学派之异·····	210
第十二章 日本集团主义论·····	213
第一节 集团主义的主张·····	213
第二节 日本集团主义的虚实·····	215
第十三章 论日本江户时期的朱子学·····	218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期对朱子学的接受·····	218
第二节 江户时期朱子学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表现·····	220
第三节 江户时期朱子学对日本的贡献·····	223
第十四章 江户时期的历史意识与社会意识·····	226
第一节 江户时期的历史意识·····	226
第二节 江户时期的社会意识·····	232
第十五章 土田健次郎论儒学与儒教问题·····	239
第一节 以“天”的概念和“死”的问题及祭祀为切入点 分析儒学是否是宗教·····	239
第二节 与陈来“儒家·儒学·儒教”之辨,再次重申 儒学是否是宗教·····	241
第三节 日本儒学是否是儒教·····	244
第十六章 广濑弘忠的“灾害预知和灾害警报”视阈·····	247
第一节 “灾害”预知从梦想到现实·····	247
第二节 预警误报实际上也没引起混乱·····	250
第三节 灾害警报的功能及必要性·····	251
参考文献·····	254
后记·····	259

第一章 日本哲学的发展及重要 哲学家概述

第一节 日本哲学的发展

一般认为，自古代 712 年著述的《古事记》、720 年的《日本书纪》、公元 710 年至 784 年著的《万叶集》开始日本的哲学思想就萌芽产生。日本古代哲学深受中国哲学的熏陶，也具有像中国古代哲学那样大量关于人性善恶、道德伦理、性情关系、理欲关系等的论述。在日本 1800 年的《日本诸家人物志》、1816 年的《先哲丛谈·前编》、1827 年的《先哲丛谈·后编》中都记载了日本初期哲学家的思想。

日本的哲学发展按照卞崇道在《日本哲学史教程》中的标准，分为四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为公元 7 世纪前（截止到飞鸟时代），这一时期日本哲学萌芽；第二时期为公元 8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奈良时代至江户时代），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儒学、佛学与日本固有的思想融合，使日本哲学得到了发展；第三时期是 19 世纪下半期至 20 世纪中叶（明治时代 1868 年至昭和时代前期的 1945 年），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系统地传入日本，使日本哲学得到了新发展；第四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昭和时代），日本哲学进入了独自开拓研究的发展阶段。

而“江户时期儒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603—1735）为朱子学的勃兴时期；第二时期（1736—1788），为古学派崛起与朱子学相抗衡的时期；第三时期（1789—1867）是阴阳学隆盛与朱子学

相对立的时期。”^①“朱子学传入日本，经过 350 多年的传播，逐渐兴隆起来。1603 年以后，被德川幕府封为‘官学’，成为江户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德川年间的日本朱子学，就其师承关系说，可以分为下列的流派：京师朱子学派：藤原惺窝、林罗山、木下顺庵、雨森芳洲、室鸠巢、新井白石；海西朱子学派：安东省庵、藤井懒斋、贝原益轩、中村惕斋；海南朱子学派：谷时中、小仓三省、野中兼山、谷一斋、大高坂芝山、山崎暗斋、佐藤直方、浅见纲斋、三宅尚斋；大阪朱子学派：五井持轩、三宅石庵、中井鰲庵、五井兰洲、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富永仲基；宽政以后朱子学派：柴野栗山、古贺精里、尾藤二洲、赖春水、赖杏坪、安积艮斋、赖山阳；水户学派：德川光国、安积谈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德川齐昭、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②由此可知，在日本哲学的发展中，中国的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节 日本重要哲学家概述

《古事记》作者是太安万侶；《日本书纪》是经壬申之乱而取得政权的天武天皇欲向外宣示自身之皇统而下令舍人亲王等人所著。太安万侶、舍人亲王等人可以称为日本最早的哲学家，开启了日本最早的哲学、伦理思辨。

由此开始日本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例如：室鸠巢、贝原益轩、富永仲基、雨森芳洲、山崎暗斋、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徠、太宰春台、中江藤树、佐藤一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安藤昌益、司马江汉、三浦梅园、皆川淇园、山片蟠桃、镰田柳泓、加藤弘之、中江兆民、植木枝盛、幸德秋水、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三木清、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田中王堂、桑木严翼、户坂润、波多野精、藤原惺窝、林罗山、木下顺庵、新井白石、安东省庵、藤井懒斋、中村惕斋、谷时中、小仓三省、野

① [日] 牧野谦次郎：《日本汉学史》，世界堂书店出版社 1938 年版，第 103 页。

②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 页。

中兼山、谷一斋、大高坂芝山、佐藤直方、浅见纲斋、三宅尚斋、五井持轩、三宅石庵、中井鰲庵、五井兰洲、中井竹山、中井履轩、柴野栗山、古贺精里、尾藤二洲、赖春水、赖杏坪、安积艮斋、赖山阳、德川光国、安积谈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德川齐昭、藤田幽谷……

当代日本哲学家有：市川浩、井洞俊彦、今道友信、岩崎允胤、梅原猛、大森庄藏、冈田武彦、加藤尚武、泽田允茂、芝田进午、末木刚博、铃木正、铃木亨、竹内良知、竹内芳郎、武谷三男、寺尾五郎、永井成男、中村元、中村雄二郎、西谷启治、广松涉、船山信一、星野芳郎、本多修郎、前田专学、丸山真男、三宅正彦、山崎正一、山本晴义、汤浅泰雄、吉田杰俊、土田健次郎、池田知久、池田秀三、中岛隆博、吾妻重二、沟口雄三、三浦国雄、石川忠久、柴田笃、今枝二郎等。

日本重要哲学家众多，他们的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因而对这些著作进行编译和研究绝非易事。本书主要对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哲学家伊藤仁斋、浅见纲斋、本居宣长的著作进行编译和研究。

第三节 儒家思想在日本传播与研究的发展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应神天皇十六年）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5世纪初期，百济使者阿直岐来到日本，成为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传授汉学。经他推荐，翌年，百济博士和边吉师（后世称王仁，应是一位生活在当时朝鲜半岛的汉族移民）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中国儒家经典也来到日本，这就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始。513年（继体天皇七年）百济国王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来到日本，并且此后以轮换的办法持续向日派遣五经博士。又据《隋书·侯国传》的记载，公元5世纪前半叶，日本皇室和贵族已接受汉字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化不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与外来文明的“嫁接”，逐步形成的包括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艺术等内容的多元的文化体系。“大和政权在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之后，主要是以中国儒家的‘德政’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的。儒家的‘政在养民’、‘农者天下之本’、‘俭约戒奢’、‘简人任能’等观念对于以天皇为

首的中央权力集团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仁’、‘义’思想被视为治国、治民之道。比如天平宝字三年（759）六月二十二日，淳仁天皇发布敕旨，要求各级官吏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施政的标准，并明确规定了具体内容：‘不滥杀生，能矜贫苦为仁；断诸邪恶，修诸善行为义；事上尽忠，抚下有慈为礼；遍知庶事，断决是非为智；与物不妄，触事皆正为信。’关于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中央权力集团吸纳中国儒家‘德政’思想治世的材料，在8世纪制定的‘律令’以及历史著作《古事记》、《六国史》中有明确记载，可谓史不绝书。”^①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用汉文书写的《十七条宪法》。这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内容多出自中国儒家思想，以劝善弃恶的训诫和说教为主，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压制大贵族的势力，消除人民的反抗。十七条中最著名的有三条，即：第一条“以和为贵”；第二条奉“佛、法、僧三宝”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第十七条“对重大之事情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决断”。

奈良时代（710—794），正值大唐的鼎盛阶段，是日本集中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日本学习唐朝文化，在教育上就是仿唐朝的教育制度建立了自己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朝廷在京城设大学寮（简称大学），在地方的“国”设“国学”。“大学寮”的任务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能参与国政的官吏，教学内容和教科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而“国学”是为地方上层人物子弟设置的，也以儒学教育为主，经学占了重要地位。到6世纪，儒家的影响越来越大。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他们理解的“忠”更多地意味着对自己领主的忠诚乃至献出生命。日本本土化的儒家思想，一则表现出与武士道精神培育紧密结合，强调对领主、天皇的顺从与忠诚；二则渗透到了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之中，形成从小家上升到国家，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与忠诚。日本人并非毫无选择地吸收中国儒学，而是按照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主体需求，对儒学进行取舍。如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所引儒家经典有《礼记》、《论语》、《孝经》等，却独无《孟子》，无非是由于孟子的易姓革命和暴君放伐思想，不符合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情。因此，日本当代史

^① 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学家森岛通夫指出,中国的儒学与日本的儒学相比,至少有以下两个显著区别:前者以“仁”为中心,后者以“忠”为核心;前者是人道主义的,后者则是民族主义的。暂不管森岛通夫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这就是,被移植到日本后的儒学,已经与日本的国情与传统相结合而发生了“变形”。

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各类学校中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儒学就是他们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然而“关于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与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将关注点放在江户时代的儒学方面,而对于从5世纪初期传入日本直至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的日本儒学,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将其视为江户时代(1603—1867)儒学的前史而略加概述。比如日本学者万羽正朋的《日本儒教论》,牧野谦次郎的《日本汉学史》,安井小太郎的《日本儒学史》等,就是这样定位的。有些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①。而自7世纪至12世纪的日本学校教育体系,实际上成为早期日本儒学的传播阵地,这样就使得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平安时代前期即9世纪,可以说是日本所谓“唐风文化”的全盛期。这个时期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教育机构——大学寮也进入它的最盛期。儒学的流行和大学寮的兴盛,与建立和稳固中央集权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是社会需要以及政治力量扶持的结果。9世纪后半期,由于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削弱,随之政治力量的衰落必然连带儒学的消沉,从而使儒学走向低谷。10世纪末以后,大学寮的教官开始“世袭化”,儒学进一步萎缩为少数博士学官的“家业”。从10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情况来看,博士在大学寮中是最早开始世袭化的,由小规和三善两家世袭。此时的儒学,已从律令时代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退缩为世代相传的生活技艺。

江户时代以前,统治阶级统治人民最重要的手段是宗教,而到了江户时代,人民有了非宗教的现实主义思想。因而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仅靠宗教就不够了,还必须采取带有现实主义的思想。他们认识到能够满足统治

^① 王健:《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神体儒用的辨析》,河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阶级这种需要的乃是儒学，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举为官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当时通过采取培养完全独立于公家（贵族）和僧侣之外的大批儒者的政策，儒学得以迅速推广，占据了封建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和幕府政治结合起来。13世纪初（镰仓时代中期），中国的朱子学（又称家学、理学）已传入日本。为了获取新的思想资料，南宋以后的禅僧大多兼习理学，来华的日本佛僧就是在这些禅院中受到新儒学的熏陶的。他们回到日本后，很快地将理学主要是朱子学带进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林罗山，对德川幕府早期成立时的各种相关制度、礼仪、规章和政策法令的制定贡献很大，他对日本儒学的推展亦功不可没。山鹿素行也是江户初期的儒学家，他汲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养分，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根据和岛芳男在《中世的儒学》中的介绍，日本的东洋文库保存有朱熹的《中庸章句》抄本，卷末署有“正治二年三月四日，大江宗光”的识语。据伊地知季安在《汉学纪源》中的推测，禅僧俊苾在1211年从南宋携回书籍两千余卷，其中儒学的256卷，可能包含有宋学著作。1241年，在日本首次复刻了朱熹的《论语集注》。有大部分学者认为，带入宋学著作，并有一定理解的，是禅僧园尔辩圆。园尔辩圆于1235年到宋（当时的中国），1241年归国。据说他带回的书中有朱熹的《论语精义》、《大学或问》等著作。1257年，他为镰仓幕府时期的执权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奎堂的著作《大明录》。《大明录》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关于儒则尊奉宋学，大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学说。园尔还著有《三教典籍目录》、《三教要略》。日本学者研究德川时代，不仅幕府中央的思想领域被朱子学占领，就是地方教育也大多被朱子学者控制。由此可见，朱子学的确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惺窝（1561—1619）是江户初期儒学家，是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后裔。在江户初期思想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望。其弟子林罗山、松水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均系著名儒学大师，被时人称为“藤门四天王”。著有《千代源草》、《四书五经倭调》等书。他脱离禅门转向儒学，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发展的象征性事件。他批评奉汉唐旧注为圭臬的旧儒学，而主张宋明的新儒学。“日本新儒学自从禅宗佛学的宗教庇护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刻起，便在政治上被解放它的人操纵为支持幕府政治事业的一种意识形态文化。一旦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本新儒学就成为德川制度的政治

俘虏。”^① 藤原惺窝兼容不同的儒家学派,“对于调和不同信仰的藤原惺窝来说,只要达到了为实现社会秩序和政治和平提供完善的伦理和道德准则的目标,不管新儒学是统一于程朱学派,还是统一于陆王学派,都无关紧要。”^② 在藤原惺窝之后,继续致力于儒学独立以及道德秩序建构的是惺窝的大弟子林罗山。儒学传入日本之初只是在宫廷贵族和僧侣之间传播,后来作为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意识形态,逐渐在武士阶层中渗透蔓延。幕府想通过异学之禁来强化朱子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事实上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儒学学者在自己学问的形成过程中师从不同的学派,向不同学派的先生学习已经比较普遍了。森岛通夫所说:“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③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心学复兴,以阳明学为精神支柱,倡导人的主体精神和勇于改革的实践勇气,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明治维新运动注入新的精神动力。中江藤树(1608—1648),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的儒家学者。一般认为他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鼻祖,著有《大学解》、《中庸解》、《论语解》、《鉴草》、《孝经启蒙》、《论语乡党启蒙翼传》、《翁问答》等。大盐平八郎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下级武士、阳明学者,他中年退職后潜心于阳明学,著有《洗心洞札记》。日本维新也是由王学为其先导。例如,佐藤一斋的再传弟子吉田松阴(1830—1859)是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他虽不只受阳明学的影响,但阳明学的行动性质和战斗精神是他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根据阳明学的思想,吉田松阴主张不能拘泥于既成的制度和规范,而应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批评和改造现实的不合理体制。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再度复兴的阳明心学,虽然仍是学者书院中的研讨对象,但它带来的社会效果则是改革性的,着眼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和新制度的重建。在禅僧之外,也有中国的儒者到日本的。不过他们人数极少,影响远在禅僧之下。据清末广东东莞人陈伯陶所辑《宋东莞遗民录》下卷《李用传》载,南宋遗民李用是“潜心理学”之人,于1276年(宋德祐二年)“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④

① 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② [日]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の研究》,东京:创文社1980年版,第187页。

③ [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④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1—182页。

虽然宋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影响到社会的上层，但它只是作为皇室成员和公卿的学问修养而存在，并没有成为被社会需要的一种思想资源而产生更深层的影响，只是一种宫廷儒学。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不仅在各藩设立的学校中，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而且遍设于日本各地的、数以千计的“寺小屋”（类似中国农村的村学与私塾），也以中国的《三字经》、《千字文》等为蒙学读物。日本人还自己编写了一些蒙学读物，如《都路》（地名汇编）、《名头》（类似中国的《百家姓》、《童子教》、《实语教》）、《庭训往来》（类似中国的尺牍）、《商卖往来》等。为女子专门编写的蒙学读物，则有《女大亨》、《女实语教》、《女四书》等。正是通过中国和日本的这些蒙学读物，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极其广泛地渗透于日本民间大众中。日本近世时代是封建文化的最高峰。从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经五代将军纲吉、六代将军家宣，到七代将军家继，他们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五山僧侣和天海僧正等僧侣，清原秀贤等公卿以及神龙院梵舜等神道家。九代德川将军都提倡封建纲常礼教，奖励学问，发展文化，命令儒者、僧侣、神道家搜集、整理和刊行战国时代散佚的古书，并收纳金泽文库的藏书。由于统治阶级宣传忠孝、仁恕、节俭之道，所以《四书》、《史记》、《六韬三略》和《贞观政要》等儒家经典以及日本古典中的王道政治思想、经世致用之学、帝王之学和人道伦理之学，俱已成为统治阶级自身修养和政策实施的参考书。幕府还组织学者编辑有益民众教化和思想启蒙的书籍。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封建礼教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潮。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古文学派、水户学派、暗斋学派等，彼此间之主张都存在着异同之互动关系。儒教的主体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1600年，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建立德川政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的大约260年间，政权由德川家族掌握，这段时期被称为江户时代。山片蟠桃（1746—1821）是日本德川时代末期的思想家。幼时为大阪富商家僮，曾习儒学和天文学，并对兰学（自荷兰传来的西方技术）颇有心得。晚年以十九年的时间，著成《梦之代》十二卷。书中论述天文、地理、历史、制度、经济、阴阳、鬼神、疾病等；宣传日心说，有无神论思想，介绍欧洲科学。对神道、佛教、儒家思想都加以评判，当时有一定的启蒙作用。然而它却使日本民族在处理外来的儒家文化的心路历程中所形成的“实利性”

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最有效的发挥。山片蟠桃（1746—1821）曾跟随中井兄弟学习儒学。山片蟠桃从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出发，充分肯定了欧洲自然科学的优越性，怀德堂学派的一些学者以及前野良泽和司马江汉等就是批判儒家自然观的典型。前野良泽在其所著的《管蠡秘言》的附录中指出，作为儒家自然观基础的五行说“仅中国一地之私言”。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对东方的封建制度提出质疑，进而肯定西方社会的合理性。司马江汉认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平等观念是正确的。前野良泽则认为儒学所影响的范围不过占世界的十分之一，而天主教的影响却遍及各大洲，而且天主教的平等观念比儒教更先进。在他看来，“以教养鳏寡孤独废疾贫困之人，为立政教之根本”。^①然而，这种立足于西方科学知识的新世界观的探索和对旧知识系统的批判，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20—30年代，因陆续受到幕府的镇压，在未能充分展开时即逐步萎缩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在严酷的生存挑战面前重新复苏。江户幕府日趋衰落所带来的社会变动、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江户时代中期开始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日本儒学也做出了自身相应的理论调适，因而其内部也自发地生发出了近代性的萌芽。尽管这些因素不能必然启动日本现代化的运动，但它毕竟为日后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铺垫，并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②在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废除了以“忠孝”之道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的《教育敕语》体制，学校的教科书也不再选取《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为教材。儒学仅仅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成为中国思想史或日本思想史著述的评价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家伦理在日本当代生活中完全丧失了影响力。

当前，土田健次郎、石川忠久、大岛晃、池田知久、仓田信靖、三浦国雄、柴田笃、池田秀三、竹内弘行、吾妻重二、小岛毅、沟口雄三、佐藤炼太郎等学者、专家仍在研究儒学，在民间也有很多读经团体，有少数

① [日] 家永三郎、石母田正：《日本思想大系·六十四·洋学上》，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135页。

② [美] 赖肖尔：《日本人》，日译本，文艺春秋社1982年版，第22页。